

严中平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10.4

严中平

文

集

(京) 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中平文集/严中平著;经君健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

ISBN 7-5004-1754-3

I. 严... II. ①严... ②经... III. ①经济史-中国-文集
②严中平-文集 IV.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1213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顺义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389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38.00元

序 言

本书编者经君健先生是严老生前的得力助手,与严老切磋学问近四十年。他同另一位与严老有长期学术交往的魏金玉先生对严老遗著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本书中《关于洋务派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评价问题》,就是魏金玉先生根据手稿整理出来的。而全部论文和手稿的审理编次,本书编者更是投下了大量的宝贵劳动。他不但对严老的单篇文章逐一进行精辟的阐发,而且对严老的学术成就给予系统的归纳和总体的评价。因此,本文集的出版,不但使严老这一中国经济史学奠基人的全部学术遗产,得以完整保存,并贡献于社会,传诸后世,而且也使得严老毕生的学术道路、研究历程、治学态度和科学贡献,都给后人留下了清晰的印象。这是很可纪念的。

我在严老领导主持之下,也工作了整整四十年。他治学的严谨,是有口皆碑的,我自己也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认为这里面最可宝贵的精华,是他对真理探讨的执着追求。他是一位坚持理论原则、执着追求真理的典范。他所坚持的理论原则,正如本书编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是“唯一能正确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毕生研究实践使他越来越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史学方法”,因此,“对自己确认的原则,从来不轻易放弃”。他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的确具有这一鲜明的特点。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当他认定自己的看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时,他对这个看法的坚持,可以达到不作任何让步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屡屡看到他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当他在理论原则指导之下,对问题的研究获得新的启示时,他又勇于进行自我修订,不断自我更新对问题的认识。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问题上,在洋

务运动和闭关政策评价的问题上,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可以说,正是由于坚持理论原则、执着追求真理,他才勇于在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自我修订。正如他在一篇对青年讲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中所说:“科学的治学态度”,是“既要坚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又要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材料,总结出新的结论”。他以此教育青年,自己也身体力行,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执着追求真理,充满着严老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战斗的一生。

不断自我修订,这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人类只能认识到问题的无限,却不能结束无限的问题。在真理的历史长卷中,会出现无限无穷的“问号”,但永远不会出现一个“Full Stop”。在严老那里,“Full Stop”也是不存在的。而他勇于提出“问号”的精神,则给我们以无穷启迪的智慧,增加我们向前探索的力量。

汪敬虞

1992年1月严老逝世周年前3日

坚持真理 贡献卓越

——代前言

严中平先生是新中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严先生所写的以《中国棉纺织史稿》为代表的许多著作,在经济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文章,有些现在已经难于查找了。所以将他未曾收入专书的文章汇集成册,以便大家参考利用,同时也藉以表达我们对严先生深切的缅怀之情。

本书收集的严先生的论著,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关于经济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严先生于1950年回国后不久就接受了领导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组的任务,全力投入这项新的工作,并为这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努力。50年代中叶,严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一文中呼吁重视经济史学。他指出,经济史这一学科乃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以及通史所不可忽略的基础学科。“不能想象,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忽略了对于经济基础的分析,能够对上层建筑做出全面深刻的研究成果来。”他认为,当时“关于近代中国社会许多历史问题的著作,不能算太少,特别是农民起义史的研究,论述最多。但是这些著作对于经济基础的分析,往往缺乏丰富的资料,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落后状态,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各项历史问题研究上的薄弱环节。他大声疾呼:“我们不妨夸大一点这样说,现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关口,不加强经济史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他希望人们充分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尽快扭转上述的不正常局面。在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他再次就中国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了阐述,并提出,在从事经济史学科的专业队伍小得和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很不相称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从事上层建筑史的研究时,就需要分出更多的力量来研究经济基础的历史;经济学家主要是从事当前问题的研究的,若能分出更多的力量来兼做历史问题的研究就更好了。”

在严先生发出呼吁后的30年中,在历史学和经济史学界的科研、教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学科的建设 and 普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了。严先生在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做了全面发言。《开幕词》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收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经济史资料,抢救了一些档案材料;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经济史科研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开幕词》也指出了三十多年来经济史研究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和缺点:由于缺乏总体的发展设想,学科各方面的研究深度极不平衡,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认真提出和讨论;当前的研究中,思想还不够解放,视野还不够宽广;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指导简单化的倾向。《开幕词》就今后发展经济史这门学科提出了建议和希望:继续大力进行资料工作;广泛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建立横向联系,共同推进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在此,严先生再次强调了他一贯主张的立“四新”、(即要求努力做到: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提出新的材料,或者运用新的方法)破“四就”(即必须对外国经济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对政治、法律、典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对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所了解,不能就所研究的那个时代而论那个时代,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的研究指导思想。《开幕词》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提出

全面的安排意见：发挥各自的优势，普遍开展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做全国经济史的研究；重点研究近、现代经济史，但又不忽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同时，他在《开幕词》中明确了经济史学的目的和任务：“对内，我们应注意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益，努力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对外，我们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争得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严先生的这些想法，是集中大家的智慧的产物，它定会在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中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从本书所收第一组的四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严先生极为重视经济史学的资料工作。50年代时，他就认为，当时主要的、迫切的任务是大力收集、整理、编纂资料，以“解救资料饥荒”。除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文中强调之外，他还专门写了《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一文，特别强调了资料对于经济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在经济史学科研和教学队伍很小，而资料却多得浩如烟海的情况下，他强调在为个人研究而收集资料的同时，更多地分工合作，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奠定基础而收集整理资料。他号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花费更多的劳力，整编资料，为科学的全面昌盛，贡献自己的特长”，号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发掘、整理、编纂有价值的经济史资料，共同努力为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严先生组织领导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组的学者们编辑了一套系统而丰富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和专业史资料，为这个学科的科研和教学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也为经济史学术资料的编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严先生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写出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一文，把全组同志的经验加以升华，提供给学术界。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经济史组同志们收集、整理和编辑经济史资料的方法，这对其后编辑资料的同志有很大的启迪。更为重要

的是,他批评了以资料工作为“下手活”,是“为人作嫁”的轻视资料工作的错误思想;而强调指出,资料工作是需要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业务知识才能胜任的,是为经济史学这门科学的昌盛打好基础的艰苦的、严肃的而又光荣的任务。30年后的今天,当看到出版的大量经济史资料时,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严先生重视史料,提倡编辑史料的呼吁和行动,在我国经济史学界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方面所起的带头作用。

从这组文章中我们当然会看到,严先生除写出了高质量的经济史学术著作作为这个学科做出重要贡献之外,他更为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倾注全部心血。他不愧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第二组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问题的文章。关于帝国主义侵华问题,严先生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论江宁条约与中外通商》。这篇文章细致地分析了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的签约过程以及签约双方的目的和要求,并考察了其后的1843—1860十余年间各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状况,对这两个条约以及其后将近20年的经济史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协定关税之恶例确系中英各约所开,但税率并非按值百抽五原则议定;江宁条约后十余年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渐自广州移往上海和贸易平衡渐自入超变为出超等两个现象,其转折点均在50年代初头;中国丝、茶两项的出口增进极速,英美销华的主要物品棉布增进甚缓,以致英美非常失望,如果不是鸦片进口增加甚多,中国出超必然更大;从中外贸易方法——物物交换、交通工具——帆船,以及英美棉工业发展程度——决定棉布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等各方面观察,19世纪四五十年代现代性中外贸易关系尚未开始,外人凭借特殊权利作种种非法行为,加之中国官吏宵小的勾结,走私逃税之风甚炽,影响所及,使得通商口岸成为无法律无秩序的社会,中国社会今后的纷乱,于此十余年间已肇其端,等等。总之,他认为鸦片战争,中国是失败的,失败在清政府力不足

以卫国；各次条约，中国也是失败的，失败在军事的屈服和清朝官吏毫无外交常识。然而，就在这两重失败之余，观乎丝茶出口之盛，棉布进口之少，以及贸易平衡之好转，可知这十余年的中外通商上，中国却是胜利的、成功的，“成功在晓光篝灯时，竹轮木梭之上，成功在山野桑林间，茶农蚕妇之卑贱的劳力上！”换言之，当时中国在通商上的成功全在于农家的手工业生产。

严先生于1947年至1950年在英国进修，收集了大量有关帝国主义侵华问题，特别是关于两次鸦片战争问题的历史资料。通过这项工作，严先生清楚地看到了老殖民主义侵华令人发指的种种罪恶，他对此极为愤怒，准备回国后撰写专著，加以揭露和鞭挞。只因回国后服从组织分配，很快接手经济史方面的领导工作，有关这个问题他只写了一些文章，编辑了一些资料，而未能实行原来的计划。他本来想，经济史领导工作告一段落后，仍将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当时只是暂时搁置。谁知这个“暂时”如此之长，直至他逝世时也未能抽出时间利用这批资料写成专著，而成为永久的遗憾。

严先生对老殖民主义的罪行是深恶痛绝的。他十分明确而坚定地站在被侵略者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他的毫不含糊的立场和态度，在他所著《老殖民主义史话》一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在此收入的几篇关于帝国主义侵华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也同样如此。

19世纪40年代英美侵略者以海盗手段进行掠夺中国劳工。当时被英美海盗刽子手所掠夺的中国劳工，被称为“苦力”或“猪仔”。把苦力运往国外的船只，英国人自己给它起的名符其实的绰号是“浮动地狱”。严先生所写的《“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一文，充分揭露苦力买卖这一“世间最残酷的罪行”，特别是“浮动地狱”中成百苦力被活活杀死、烧死的惨绝人寰的罪行；同时也描写了苦力在船上的殊死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凭藉“条约权利”前来中国的领事和商人，“无

异于海盗。他们残忍、狡猾、阴险、无耻、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严先生所写《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一文，揭露了他们在中国走私鸦片、掠卖人口、破坏中国海关征税制度、霸占沿海贸易、自做海盗而又自己护航等等罪恶行径。他指出，“当时的英美侵略者是‘既不畏惧冥冥苍天，又不顾及人间正义’的；中国人民是用以牙还牙的惩凶行动对付侵略者的；然而清统治者却是‘连碰都不敢碰到外国人的’。这就是五口通商时代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基本情况。”

1953年正值马克思逝世70周年之际，严先生写了《马克思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一文，热情洋溢地称颂了马克思对中国人民的崇高友谊。特别指出，马克思于1853到1860年间，曾写了一系列讨论中国问题的论文，彻底揭穿英国侵略者制造各式各样的藉口，发布各式各样的伪造文件，采取极端严格的机密措施，来掩盖其侵略者的丑恶嘴脸，以此声援中国人民。

英国资产阶级中和对华贸易直接有利害关系的方面有两大部分，即鸦片利益集团和纺织利益集团。前者是以鸦片走私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后者则是以向中国推销制造品和从中国贩买丝茶为重要利润来源的。后者是曼切斯特、格拉斯哥、利物浦、伯明罕、伦敦等等城市和对华贸易有关的工业资本家、进出口商人、航运资本家、银行家等等。这两个利益集团，乃是英国两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幕后策动力量。严先生发表的《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及《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对华关系，以及鸦片和纺织这两个资本家利益集团策动侵略的活动情况。过去学者们虽然对两次鸦片战争本身的研究已有不少了，而严先生的这两篇史料则准确而有力地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英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发动这两次战争，这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从他于病榻之上所写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

的通讯》一文使我们明显感到，严先生晚年的时候，反帝的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更加明确了。这篇通讯，是他和汪敬虞先生讨论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这一学术问题的。确如汪先生所写，中国近代经济史应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中心线索的这一提法，乃是1960年在为高校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时，由严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红线”，并形象而生动地喻之为穿糖葫芦的竹签。这一命题，在当时得到编写组中许多同志的赞同。30年后，汪先生写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一文，阐明并发展了这个观点，而这时严先生却已经放弃了它，改而认为：关键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暴力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必须以此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红线”，而“不能单纯用价值规律去说明全部经济现象”。这里只想指出，严先生用以代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红线”的，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严先生愈到晚年，反帝的思想愈加明确，对帝国主义的憎恶愈加加深了。通过严先生前面的文章，我们似乎看到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关于中国近代史“红线”问题看法的改变，是合乎他的思想逻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问题，当然是一个完全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在此无需做出评价，也不可能做出恰当的评价，而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正因如此，本书也附载汪先生的文章，以供大家参考。

80年代中叶，有同志发表文章说，帝国主义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的“开关”是“好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落后的封建主义。对这个观点，严先生十分气愤。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讨论清楚。”他即愤笔疾书，写了《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评价问题还需讨论》一文，表明他的态度和立场——他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的态度和立场，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都是丝毫不含糊的。

不仅是对待侵华问题，严先生对一切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国家和民族都抱同情的态度，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说话，毫不留情地揭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收入《老殖民主义史话选》一书的全部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本书的《全面否定，坚决骂倒》一文，是根据已经发表的《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一文的修改稿收入的。有趣的是，今年正值哥伦布抵达西半球五百周年。世界上同时出现两种相反的活动：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在大搞庆祝和纪念，被“发现”地区的土著人种则在进行反对和抵制这些活动，批判哥伦布，要求得到公正、平等、教育和尊重他们土地等方面的权利。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争论也正反映了不同立场的人们的斗争。严先生的著作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当然，对哥伦布的评价也和上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红线”问题一样，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我们从这一组文章可以看出，严先生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老殖民主义侵华的历史资料，并且是以鲜明的中华民族立场来对待这段历史，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批判老殖民主义的罪行的。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上的深刻性，他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均持批判态度。他所写的《老殖民主义史话选》一书，充分体现这一点。这种学术上的理性认识，直接指导了他的为人和行动。他在英国进修时，正值全国解放，他欢欣鼓舞毅然回归摆脱了半殖民地统治的新中国。他无情地批判一切对祖国不利的言行和任何人的媚外态度。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十分坚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当然还应提到，严先生的坚定爱国主义立场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这从他热心于翻译和宣传马克思有关中国问题和印度问题的多篇著作就足以表明。由此我们可清晰地感到，留在我们心中的严先生，是一位大义凛然的、在帝国主义面前绝无软骨的爱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第三组是关于太平天国问题的文章。19世纪后期中国的人民起义，特别是关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镇压人民起义的问题，也是严先生注意研究的问题之一。他在英国进修时，从英国下

院蓝皮书、英国外交部档案、怡和洋行档案、当事人的通信等私人文件以及真实可信的公开出版物中收集到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史料。

严先生研究太平天国问题，重点在于英帝国主义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和与清政府的关系。《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一文细致地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形势指出，1853年2月，英国资产阶级侵略者本来打算和清政府一道镇压太平天国的，是太平军迅速推进、解放南京的英勇行动，斩断了正在积极进行的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的第一次反革命的勾结。尽管清政府非常希望英国侵略者协助镇压太平天国，但清楚了解太平天国推进形势的英国侵略者，因慑于当时太平天国的锐势，而不敢轻率从事。香港总督兼英国使华全权代表文翰明确地表示：“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是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敏的政策。”

怡和公司上海分店负责人平均每三天就要向香港总公司做一次书面报告。严先生从剑桥大学所藏怡和公司档案里1853—1859年上海分店的11份报告中摘录了有关小刀会的非常宝贵的史料，辑为《小刀会上海起义新史料》，一方面歌颂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军敌友分明，纪律严整，是人民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同时揭露清军滥杀无辜，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人民的罪行。他又从怡和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中选编了有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攻守宁波的通信，编成《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攻守宁波纪实》，把1861年12月8日至1862年5月11日太平军李世贤部下解放并据守浙江宁波的半年时间内的情况充分而细致地呈现出来。太平军的这段历史，过去研究很少，这篇文字起着填补空白的作用。由于所展示的材料都是敌视太平军的外国侵略者的内部报告，其对太平

军的肯定、称赞之词，应是相当可信的。这篇文章分析了太平军在浙东方面的战略，并以惋惜的笔触论及海口宁波的失守使太平军丢掉了由海上联络南中国沿海各省人民和开辟海上战场的机会。作者进而指出，正是在这半年时间里，英国侵略者在政策上作了重大的改变，彻底抛弃了于太平天国初期采取的中立面孔，转而为对太平军的侵犯行动——由表面中立暗助清政府，改变成明目张胆自己动手进攻太平军；由放任在华使节和军人对通商口岸作零星的消极的战术性的防御措施，改变成由中央政府决定根本大计，积极向太平军要害区域作系统的深入的战略性的进攻。由于外国侵略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是太平天国的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确定英国侵略者上述政策转变的时间，是很有意义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 1861 年 11 月的北京政变。因此，严先生又有《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之作。该文披露了 1861 年英国驻清政府公使卜鲁斯和他的中文秘书威妥玛于京津之间的通信。这些信件表明，通过北京政变，英国侵略者培植的驯服奴才奕訢上台，英国侵略者可以在华为所欲为了，所以英国立即开始出力支持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起义军大屠杀了。而在此前，从 1853 年起，清政府就要求英国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英国迄未积极地大力援助。

1863 年 8 月下旬，淮军开始进攻苏州，英国戈登率“常胜军”相助。11 月下旬，经戈登致函，诱降了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郅永宽等，刺杀了坚守不屈的慕王谭绍光，把苏州城献降给了清军。八个太平军降将本期获得奖赏，不料数日后便被李鸿章统统杀戮。这就是所谓“李鸿章杀降”。严先生所写《戈登论李鸿章苏州杀降动机书并跋》详细地分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常胜军首领戈登于 1863 年 12 月 14 日给英国驻清公使卜鲁斯的信，将刽子手李鸿章之流背信弃义、残忍好杀、贪财虏掠的行为刻画得十分清楚，同时也批判了起义军中降将的可耻及其不曾料到的可悲下场，还揭露了英国侵略者戈登之流对中国人民财宝垂涎的丑态。他那犀利的

笔锋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罪恶行径是绝不留情的。

我们从这组文章可以认定，严先生是一位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同情和支持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第四组是关于史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严先生生前曾留下一批关于对洋务派兴办新式民用企业评价问题的手稿。在他逝世以后，由魏金玉先生将这批手稿加工整理，题为《关于洋务派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评价问题》，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在这批手稿中，严先生发表了他对洋务运动的看法。他认为，19世纪初叶以后，“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需要变通数千年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成法，开创数千年未有之新局面和新风气，洋务派有见识、有决心、有魄力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兴办新式民用企业，为促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提供出数千年前辈所不曾提供的新的东西。他们所直接主办和鼓励的新式民用企业为数不是很多，经营也不很成功，但当时的问题首先是办不办的问题，不是办了多少和办得好坏的问题。尤其必须提出的是，他们是在顽固派同辈以捐弃礼义廉耻，丧失尊君亲上之民心，破坏祖宗成法以乱天下，非奸即谄，用夷变夏等种种大帽子攻击之下，坚持开创新风气提供了新的东西的。他们所提供的新东西为中国的民族经济现代化开创了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应该给予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以高度评价”。关于对洋务派的评价问题，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严先生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化了。

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严先生讨论了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而说明他对洋务派问题看法的方法论依据。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进步性、落后性或反动性的标准便应视其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义上对生产力所发挥的反作用而定。这样研究的结论，我们称之为规律性评价。”“所谓阶级观点，就是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去研究社会各阶级的

经济地位,从而根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那个被压迫阶级的利害关系去评价其进步性、落后性或反动性。这样研究的结论,我们称之为价值性评价。”

实际上,严先生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严先生于1978年底所写的另一篇手稿,乃是专门讨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这篇手稿的题目是《规律性判断研究和价值性研究》,副标题是《关于历史评价的问题的构思》。从这篇文稿可以看出,它的产生,作者既是针对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的讨论,也是针对老殖民主义的侵略、特别对中国的侵略的评价问题的讨论有感而发的。严先生在这篇文稿中第一次提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规律性研究判断和价值性研究评论”的问题,他对此所作的界定是:“规律性判断研究是对事物发展变化本身的客观规律的研究,价值性研究评论是对事物发展变化对人的利害关系的研究”。看来,这一界定比上述讨论洋务派评价问题的文稿中的提法更为简括。在1986年定稿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评价问题还需讨论》一文中,已经运用这一方法分析评价帝国主义侵华问题。可见他考虑这个问题已有十多年了,他对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问题的研究和评价,都是在大量的扎实史料的基础上,遵循了他的理论和方法做出的结果,绝非为了应时应景赶时髦。

严先生对自己确认的原则从来都不轻易地放弃。他对这个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的结果明显地表明,他对殖民主义罪恶暴行极端憎恨,对一切被压迫人民深切同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对中华民族无比热爱;对反动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的活动满腔愤怒;对人民抵抗斗争坚决支持;而对一切有利于祖国进步兴旺的事物则满腔热情地尽情歌颂。

文如其人。当我们重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耿直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严先生达到这样的境地,不是偶然的。他从中学时代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